

为生命美学补“历史性” ——生命美学视野下的德国古典美学

杨一博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 重庆, 401120)

摘要: 生命美学以超主客对立、超理性主义作为其主要的理论特征, 但其在与实践美学的理论交集中, 这些特征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实质上, 这些质疑与批判的逻辑源头是孤立地将生命作为生命美学的核心, 忽视了生命与美学的内在历史关联。生命对于美学不是一种逻辑的在先, 生命美学不是指美学对生命的关照。与之相反, 生命是美学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理论契机。从这一视野出发, 可以将生命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关联起来, 其不仅赋予了德国古典美学新的理论关照, 也可使生命美学获得新的理论增长点。

关键词: 生命美学; 实践美学; 德国古典美学; 主客对立; 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2-0013-06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 在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 生命美学以西方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哲学为源头, 以超主客二分、超理性主义作为其理论特征批判实践美学, 试图以生命的概念置换实践美学中的实践范畴。在对实践美学的批判与重释中, 生命美学的理论特征不断遭到质疑, 其自身对这些批判的反思也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泥潭。可以认为, 生命美学所固守的超主客二分、超理性主义特征已无法作为其理论的基点, 其必须破除对这些理论特征的固执, 将生命作为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契机, 还原生命美学应有的历史性。^①基于这种方式, 生命美学可以真正地打破知识和理性主义的理论禁锢, 重新审视德国古典美学, 发现生命是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隐秘动力。通过生命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的内在关联, 可以为生命美学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理论支持, 这也符合生命美学的理论内在逻辑。

现、当代美学开始尝试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这正是生命美学在西方的诞生之故。”^{[1](13)}基于这一基础, 生命美学认为只有站在超主客对立的立场, 才能将审美置于最本源的位置, 而同样作为本源的生命也就在此与审美相遇, 即, “审美活动的生成方式的根本特征正是表现在把主客体的对峙‘括出去’, 表现在从主客体的对峙超越出去, 进入更为原初、更为本真的生命存在, 即主客‘同一’的生命存在。”^{[1](70)}“只有从超主客关系出发, 我们才会注意到, 审美活动不是什么认识活动的附庸……只有它, 才是最为根本、最为原初的, 也才是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1](338)}

以超越主客二元的对立为准则, 生命美学批判实践美学从主客出发处理审美的问题, 认为“实践原则在实践美学那里实际只是一种‘叙事策略’, 是仍旧从自然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角度即知识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2]。并且, 生命美学更为彻底地认为只要在审美活动中存有主、客两个层面, 无论是分立还是统一, 都是与生命美学不相融合的, “只有超主客关系中的美学问题才是真正的美学问题”^[3]。

生命美学超主客二元的理论特征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判, 例如实践美学认为, “实践”概念并非像生命美学所批判的那样, 是以主客二分为出发点的“实践本体论”, 它的最大理论品格和逻辑指向是取消了主体

生命美学在建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 这一理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生命美学以西方现当代美学为源头, 直接继承了其破除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背景。如潘知常所言: “西方

收稿日期: 2015-07-29; 修回日期: 2016-03-17

基金项目: 201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4BS014); 2014年度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14XZQN-13)

作者简介: 杨一博(1985-), 男, 重庆人, 哲学博士,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德国古典美学

与客体的二元对立”^[4]，进而认为生命美学的超主客对立是狭隘的。亦有学者认为，生命美学对主客关系否定的绝对化，导致了其对主客关系这一美学基本问题的忽视，即“生命美学把‘本源’视为‘建立在超主客关系的基础上’的说法，只是将‘主体’与‘客体’关系所做的一种想当然式的绝对化解读……更没有全面认识到主客关系中主客互动这一基本方面”。^[5]

在生命美学视之为与其具有先天理论关联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有学者也认为生命美学所坚持的超主客审美方式不能阐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现象。例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比德”说，其实质只能在主客的审美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但“中国古典美学却绝不是像生命美学所说的那样，是在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状态下的生命体验的美学”^[6]。生命美学一味地从超主客对立的立场出发，不仅无法与中国古典美学建立内在逻辑，更会因对主客关系的绝对否认，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理论上的二元主义，“生命美学以西方思想作为理论支点，在曲解‘忧生’‘忧世’关系，否认现代中国美学成就的过程中陷入自设的‘二元’对立。”^[7]

生命美学面对这些批判亦做出了回应，一方面，生命美学依然坚持超主客关系作为其理论根基，另一方面，也从其理论内部出发，对审美主客关系的存在予以一定的包容。例如潘知常在将西方当代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理论支撑的同时，亦反思其对主客体关系的绝对否认会导致理论上的虚无主义，“西方当代美学所谓审美活动也无非是通过否定客体来否定自身的有限性，通过瓦解客体来无限扩张自己，不断地挖掘自身、超越自身、不断无形式地表现自己，直到耗空为止。”^{[1](170)}再例如生命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封孝伦正是从审美活动的主客体性质出发，以审美主客关系为逻辑原点建构其生命美学的(其“三重生命”理论建构的实质即是从人、自然、社会的审美主客关联中析出的)。②总体上看，生命美学面对这些质疑与批判并未给予过多的回应，尤其近年来在国内生命美学理论书籍和学术文章中，也呈现出不再强调将超主客对立问题作为生命美学的、或是美学理论的一种普遍理论特征。③

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生命美学另一主要理论特征，因为生命美学认为，“在理性主义传统，不论其中存在着多少差异，在假定存在一种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假定人类生命活动只是外在地附属于纯粹本原而并不内在地参与纯粹本原方面，则是十分一致的。”^{[1](177)}但是生命美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传统美学理性主义背景的批判，而不是对理性本身

的否定，“美学思维毕竟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一旦丧失了严肃性就丧失了建设性。否定性思维一味否定理性，必然使得自己丧失掉了一个重要的营养基。”^{[1](173-174)}并且生命美学要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理性主义审美模式，即以生命为根源的理性主义“生命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从传统的理性主义出发去阐释实践活动的偏颇的批评，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美学就是要从非理性主义出发去提倡非理性的生命活动……从传统理性走向现代理性，从理性主义回到理性本身”。^[8]

值得注意的是，生命美学对实践美学理性主义根基的批判，未得到实践美学过多的回应，究其原因就在于生命美学并不反对理性，而是反对绝对理性主义对生命的统治，这种理论态度实质上与马克思实践理论具有一致性。但是，生命美学对理性主义的此种态度，却遭到了来自与之同属“后实践美学”阵营的超越美学的批判，在超越美学看来，生命美学局限在非理性主义前期对理性主义超越的限度内，没有彻底超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不敢否认人的实体性，最终还是落入主客二分的理论窠臼。^[9]实质上，超越美学的此种论断亦反证了生命美学对以主客二分和理性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美学的包容性。

二

生命美学对审美主客关系及理性主义的态度，反映了其超主客对立、超理性主义理论特征的失效，但是仅仅从生命美学对此两者超越的不可能性出发，不足以使它与以理性主义、以处理审美主客关系的传统美学发生内在关联，它只是开启了生命美学对传统美学理论敞开的可能性，必须从生命美学内部找到一种理论契机，使其与传统美学形成理论连续性。

生命美学的理论核心即生命，在生命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其对生命概念的不断深化，将生命的价值提升到美学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生命美学一味强调对生命本身理论的构建，试图将美学的所有问题纳入到生命的范畴中，忽视了美学与生命之间内在逻辑。生命美学抛开美学独论生命的弊端在其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一览无遗，通过对已有论争的分析，可以认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是一种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对立的缘由在于实践美学以传统美学主客二分和理性主义为根本，统一的原因则来自于生命美学在实践理论基础对生命的重释：生命美学始终坚持其与实践美学具有同质性，“事实上，马克思的美学也是生命美学，而不是实践美

学”^{[10](17)}“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即都是从人类主体自身角度解释人类审美现象的美学，只不过一个用了实践范畴，一个用了生命范畴。”^[11]

可以看到，生命美学试图将实践概念与生命概念统一起来，但是这一改造并未获理论界的普遍认同，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理论层面上，实践范畴高于生命，生命美学要求从实践活动原则转向人类生命活动原则，实质上把实践等同于功利行为，最终将审美与实践对立起来。^[12]而另一种批判声音则认为生命美学中的生命范畴是抽象空洞的，其根本无法与实践范畴划上理论等号，“生命美学认为生命活动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这种观点相信生命活动超越了实践活动……这里，生命活动无疑是抽象的，因为它没有任何规定性。这样它对于实践的超越成为了空幻的活动。”^[13]

通过以上对生命美学的批判可以看到，批判的目光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生命这一概念上，并且生命美学愈是着力建构生命的涵义，其愈是显示出这一概念的抽象性。^④究其根源就在于生命美学在建构生命的过程中，忽视了生命与美学的关联。简言之美学不是论证生命价值的手段，反之，生命是美学发展的因素，生命美学中的生命意义只能在美学的历史之中才能呈现。

实质上，生命美学亦看到了将生命孤立地作为美学对象的弊端，认为“生命美学并非是以生命为研究对象的美学”^[14]，随着生命美学理论困境的出现，学者们愈发地发现生命美学在历史向度上的缺失，“生命美学在根本上忽视了美学研究所必须秉持的一般的、宏观的、历史的维度，而只剩下建立在个体意义上的对于美的当下感受的分析”^[15]，并且开始尝试将生命美学的理论源头延伸至西方美学的发源地，使生命美学具有更加深厚的美学史基础。“虽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命哲学美学才成为显学，但若追究它的思想源头，则可以远溯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时期的康德和席勒……生命哲学美学冲决了古典主义哲学美学的绝对理性主义堡垒，对于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6]

综上所述，生命美学对美学史的关照不仅出于与实践美学论争的需要，也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即要求以美学与生命的两者关系为着眼点，基于美学理论考察生命与美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正是在此视野下，我们才能以生命美学的方式关照美学理论的源始地——德国古典美学。

三

长期以来，生命美学将德国古典美学视为实践美学的理论源泉并加以批判，“从实践美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所依托的学术资源看，前者所使用的理论范畴和对这些理论范畴的界定，大多来自德国古典美学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与此相对，生命本体论美学除了对审美之境的呈示上与中国古典美学神似外，它对西方美学理论资源的借鉴，则大多和自叔本华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17]这制造了生命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之间的断裂。

从具体理论上，生命美学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排斥主要还是从主客二分及理性主义两个方面入手的，例如王晓华站在生命美学的立场，将德国古典美学称为精神美学，认为“精神美学的困境从根本上讲在于：作为内在性的精神不能与精神之外的诸存在者打交道”^{[10](14)}，论断德国古典美学体系是通过理性主义的抽象而建构的“第一次抽象，将身与灵/物与灵部分地分离开来；第二次抽象，得出纯粹的灵的概念”^{[10](29)}。

实质上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命美学对主客二分和理性主义的超越并不具有逻辑连贯性，其不能作为割裂与德国古典美学关联的充足理由，并且德国古典美学亦非以主客二元对立及绝对理性主义为特征，恰恰相反，德国古典美学是西方美学史上对理性独断论和主客二分的第一次有力批判。

一方面，德国古典美学的大背景就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其可分为一“明”一“暗”两条路径：“明线”是从鲍姆嘉通要求重视感性开始，历经温克尔曼(理性与感性的协调)、莱辛(情感是人内在的本质)、席勒(“感性——客观”地阐释美)、黑格尔(理念的感性显现)直至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学派，感性和情感成为德国古典美学反对理性主义最有力工具，其亦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暗线”则是指在理性基础上建构的反思理性的理论路径，其以康德美学反“完善性”特征为代表^⑤，以谢林艺术哲学的非理性特征为顶峰^⑥，德国古典美学将人的理性脱离于工具理性主义，形成新理性。

另一方面，德国古典美学致力于弥合由认识论所造成的主客体之间的分裂：康德否认了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存在，但是为了避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他又不得不预设一个物自体的存在，并由此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为了消除由此带来的认识主体与客体间的断裂，康德以审美判断力勾连纯粹理性与知性，但还是无法避免物自体所带来的更高层次

的认识论分裂;其后的费希特从康德美学出发,继续弥合二元论带来的弊端,费希特认为他的哲学就是对康德判断力批判所进行的合理性的批判,“我曾经试图以我的哲学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进行一次例证”^[18],“我不认为我的知识学与康德的理论存在矛盾……从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导言中就可以隐约看到它与我理论并不冲突”^{[19](420)}。可以说,费希特哲学就是康德美学的衍生,他将康德哲学中的美学从认识论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祛除了认识论美学带来的主客二分困境;最后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在斯宾若莎主义和莱布尼茨单子论基础上,以理念论调和二元论,他们认为理念是一种目的、是自然的自身理性,是一种自然的结构,在其中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都是处于同一地位,它以主客统一的自然精神理念反对二元论体系,承认精神的客观性、甚至物质性,而这一切理论的源泉都来自其美学理论(德国浪漫主义就是谢林和黑格尔美学反对主客二分的具体体现)。

梳理以上论证可以看到,生命美学可以对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体系下的德国古典美学敞开理论契机,并且德国古典美学本身就反对绝对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元对立,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推动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正是生命这一范畴。

四

生命是美学理论发展的契机,从生命美学这一视野出发关照德国古典美学,可以看到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隐秘动力就是生命。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生命概念不单纯指人的生物性活动,而是指一种关系,即活生生的人与整个现实实在的关联性。

对现实实在的关注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大背景,在德国18世纪,以往只能在大学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哲学训练都进入到了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其要求德国古典哲学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一个鲜活的现实社会,从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到黑格尔对现实实在现象的哲学建构,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以现实为最终目标,正如卡尔·阿梅里克斯所论断,德国唯心主义与现实实在的关系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20]可以认为,德国古典美学即是一种以对现实的关照为宏旨的思维,而其以美学思维认识和建构现实实在的核心即生命。

德国古典美学之所以能够连接个别与一般、沟通感性与理性、调和个体欲望与现实需求,其出发点即

是人的生命性。例如费希特认为康德所建立的物自体使人与外在现实断裂开来,他将现实纳入到绝对自我的运动过程之中,使得客观现实实在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事物,而是自我生命的活动过程。费希特认为现实是被生命所包含的“因为内在生命是自我对自己的蕴含,并且所有现实也是蕴含于其中的”^{[19](9)},并且基于生命与现实的内在关系,费希特认为现实实在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基于生命之中的“现实实在,真正的现实实在,不能将它与事物的客观存在相混淆,后一种是建立在对自身生活维持的和依赖于自身的基础上,它是被封闭在自身之内并终将死亡的。前一种现实只存在于生命过程之中,当然生命也只能存在于这种现实中,这种生命的现实性否定了绝对的概念,并最终与他自身保持一致”^{[19](90)}。通过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到,生命绝非简单的生物性活动,它是一种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得人与现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并且通过这种统一破除了绝对概念的抽象性。

费希特的生命观是针对康德美学的批判而提出的,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美学发展,及至晚期谢林的思想,他亦正是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对生命和现实性的忽视,又重新提出对生命的关注。谢林认为,“黑格尔哲学对同一性、实在性、理性以及思维和存在的辩证论证只是基于逻辑上的论证,它仅仅表明了事物存在的必然性,却不能阐释这种逻辑思维的现实存在性。”^{[21](107-110)}由此,谢林认为要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弊端,就必须使哲学与生命联系以来,从而将时代的文化价值赋予哲学之中。^{[21](92-93)}而生命对于谢林来说就是与逻辑原则相对立的概念,它既存在于单纯的生物物性之中,又存在于精神里,生命就是物质与精神联系的过程,现实实在即是生命的全部现象。^[22]可以看到,谢林与费希特的生命观具有一致性,谢林在其后的天启哲学和艺术哲学中,试图将宗教、道德、哲学、历史统一在整体现实中,而美学则是这一现实形成的基础。

从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德国古典美学的目的是为了弥合精神与物质的分裂,创造包含生命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而这一路径亦论证了生命就是德国古典美学的推动者。而在具体的德国古典美学理论中,以费希特和席勒为代表的审美冲动理论将生命概念直接转化为具体的理论形态,亦彰显了生命与美学的理论逻辑性。

费希特与席勒的审美冲动理论核心就是生命,他们都认为现实生命与人的审美活动相统一,审美冲动就是生命在现实世界中最为合理的存在方式。费希特首先划分了认识的冲动和实践的冲动,两种冲动的目

的是“要达到表象与物之间的一种和谐，只不过在认识冲动中表象以物为准，在实践冲动中物以表象为准”。^[23](680)]而审美的冲动是连接认识与实践冲动的，并且只有审美冲动才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础，“两种不相容的冲动，即一种让物保持原样的冲动和一种要到处绝对改造物的冲动，按照我们目前对事情的看法，或按照我们那种严格地说唯一正确的看待事情的方式，是结合起来的，并且表现了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人。”^[23](681-682)]审美冲动在席勒的体系中亦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个体通过审美冲动摆脱了以往各种理论形态对人的束缚，只有审美的国家才是人所存在的最完善的关系结构，“在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强制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24](235)]

需要注意的是，席勒与费希特在审美冲动理论上有巨大的分歧，席勒在书信中明确认为他的审美冲动理论与费希特的审美冲动没有任何关联^[19](395)]，原因在于席勒认为审美冲动应该是一种诗性的想象力活动，“审美创造冲动根源是想象力”^[24](236)]，费希特的审美冲动是一种人的先验能力，是人对自我限制的本能能力，“冲动先于任何事物的实际存在而存在……所有的物质性存在源于自身对自身限制的活动……惟有通过限制性的活动才使其成为一种冲动，没有限制的冲动是行动”^[19](393-394)]。可以看到，席勒所认为的冲动是倾向于人的感性情感方面，而费希特的冲动则倾向于理性的限制层面，实质上这两种冲动理论的分歧和统一根基就在于生命本身(早在18世纪初期，冲动一词来源于心理学领域，它是指人的易怒和敏感的心理倾向，而这种心理活动的来源是人的生命活动不可避免的产物。^[25]而及至德国启蒙主义时期，托马斯修斯就建构了冲动与生命之间的理论关联，他认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存在三种基本冲动，一是希望生活长久和快乐的冲动，二是对死亡和痛苦规避的冲动，三是获取财富与权力的冲动。他将人的三种冲动置于法律中考察，最终论断人与整个社会、世界的关系都是由生命的冲动造成的。^[26]

综上所述，不论德国古典美学是在对现实性追求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具体的审美冲动理论之中，其发展都以生命为动力，而这一理论视野正是生命美学的历史性赋予的。在美学史的关照下，将生命作为美学理论发展的契机，使生命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命美学不仅可获得更深厚的理论支撑(例

如德国古典美学对宗教和信仰的探讨，亦对当下生命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并且这也是符合生命美学建立之初对其自身的定位，即“美学就是生命的最高阐释”^[27]，“‘生命美学’就是美学”^[1](40)]。

注释：

- ① “历史性”这一概念与存在主义紧密关联，历史性不指某一历史事件的存在或发生，而是指一切存在的源始性基础。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存有”来昭示历史性，从词形上看，存有(Es Gibt)中的“Es”用作形式主语的无人称的固定词组中，或与缺乏词义的无人称动词搭配。这一词的哲学意义表明“Es”是一个空洞的存在着，在存有这一词中，其表明存在之物让出空间，接受其它存在物的占领，基于此的“历史性”即指向存在敞开的方式，即事件是被历史性占领的。由此可认为，生命美学的“历史性”即指生命美学应作为美学理论展开的一种历史契机，它对于所有的美学理论具有敞开性，这种敞开不是指生命美学对其它美学理论单纯的批判或与其断裂，而是能为这些理论提供一种根植于生命美学内部、随着生命美学发展的可能性。
- ② 参见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 ③ 例如潘知常在其新作《没有美万万不能》中，更关注的是生命与审美关系所展现出的人文价值，而对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成问题则很少论述，全书不再关注超主客、超理性、追求自由等早期生命美学所强调的理论特征。详见潘知常：《没有美万万不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④ 目前国内仍有许多学者纯粹地从生命美学中生命的涵义出发，建构“儒家生命美学”“禅宗生命美学”等理论，实质上，这些理论仅仅就生命论生命，从儒家或禅宗的思想中找出其对生命论证的材料，再以审美的视野加以组合。这些理论并未体现生命对美学呈现的过程，缺乏深入的理论价值。详见刘欣：《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肖占鹏，刘伟：《唐代禅宗生命美学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 ⑤ 康德美学对完善性概念的批判是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传统理性主义视野下，正是完善性将美、道德、真融合在一起，完善性是传统理性主义的标志……康德通过对莱布尼茨引入终极客观目的论的批判，以主观合目的性原则将善与美分离，是康德对理性主义最大的攻击”。详见Frederick C. 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6-20. 亦可详见杨一博：《康德美学对完善性概念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1月12日。
- ⑥ 谢林后期思想以美学为核心，他将美学与宗教紧密关联在一起，进一步凸显了美学的非理性特征，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非理性是并非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非理性概念，谢林美学的非理性要求恢复人与当下时代现实性的关联，谢林自己将其后期美学称为“关于新的理性的科学”(详见F. W. J. Schelling: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1841-1842*. Edited by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Suhrkamp, 1977, pp.159-160)，这与生命美学的主张具有高度一致性。

参考文献：

- [1] 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 [2] 潘知常. 实践美学的一个误区: “还原预设”[J]. 学海, 2001(2): 157-160.
- [3] 潘知常. 超主客关系与美学问题[J]. 学术月刊, 2001(11): 3-5.
- [4] 闫国忠. 关于审美活动[J]. 文艺研究, 1997(1): 18-27.
- [5] 黄怀璞. 美学: 期待平等多元的对话[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93-97.
- [6] 寇鹏程. 生命美学的三个问题[J]. 唯实, 2003(1): 90-93.
- [7] 黄怀璞. 审美: “忧生”抑或“忧世”[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13-16.
- [8] 潘知常. 再谈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J]. 学术月刊, 2000(5): 49-56.
- [9] 杜正华, 刘超. 审美超越: 从生命美学到超越美学[J]. 江西社会科学, 2012(6): 43-47.
- [10] 王晓华. 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薛富兴. 生命美学: 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63-68.
- [12] 陶伯华. 生命美学是世纪之交的美学新动向吗[J]. 学术月刊, 2001(7): 71-77.
- [13] 彭富春. “后实践美学”质疑[J]. 哲学动态, 2000(7): 19-21.
- [14] 王晓华. 西方生命美学诞生的逻辑因缘与基本维度[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1): 95-101.
- [15] 吴时红. 论“后实践美学”[J]. 美育学刊, 2013(4): 86-93.
- [16] 朱鹏飞. 生命哲学美学的历史流变及其基本特征[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1): 27-33.
- [17] 刘成纪. 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18-25.
- [18] Fichte J G, Schelling F W J. The philosophical ruptur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 selected texts and correspondence [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G. Vater and David W. Woo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301.
- [19] Fichte. Early philosophical writings [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niel Breazeal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0] Karl Amerik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rman ideal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
- [21] Schelling F W J.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1841—1842 [M]. Edited by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Suhrkamp, 1977.
- [22] Frederick C. Beiser.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39.
- [23] 费希特. 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三卷[M]. 梁志学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24] 弗里德里希·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M]. 冯至, 范大灿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25] Alexander Gode von Aesch. Natural science in German romanticism [M].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198.
- [26] Christian Thomasius. Institutes of Divine jurisprudence, with selections from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Nature [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2011: 104.
- [27] 潘知常. 生命美学[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6.

Completing life aesthetics with historicity: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Aesthetics

YANG Yibo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Aesthetics include transcending dualism and transcending rationalism, bu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riticized by the Practice Aesthetics. These criticisms point out the ignor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aesthetics. Life Aesthetics does not treat life from the aesthetic standpoint. On the contrary, life is the theoretical moment for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Based on this idea, Life Aesthetics could establish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 and this could support Life Aesthetics with new views and growth point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fe Aesthetics; Practice Aesthetics;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rationalism

[编辑: 颜关明]